



瞿秋白探索推动党的宣传工作

□ 郭 阳



瞿秋白（1899—1935年）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和宣传家，中国革命文学事业的重要奠基者之一。他在党的宣传工作方面的理论与实践探索，为开辟中国革命道路、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党的理论创新作出了突出贡献。

理论探索

1920—1922年，瞿秋白以《晨报》特派记者身份派驻苏俄工作，并对苏俄的社会经济、文化教育、人民生活等多个方面进行了深入考察，深度接触了党政干部、知识分子、旧社会贵族和普通劳动者等不同阶层人士，真切地感受到布尔什维克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给这个国家带来的根本性变革。在这期间瞿秋白还系统研读了马列著作，逐步确立了共产主义信仰，并于1922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1930年，瞿秋白第二次前往苏联工作。在莫斯科参加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随后，参加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前后两次旅苏经历让他学习掌握到一些社会主义宣传工作的重要方法经验，随后将其运用到国内革命实践中，并进行了相应的理论探索。

1925年1月，瞿秋白担任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政治决议案草案审查小组组长。会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央局委员、中央宣传部委员。1927年，瞿秋白在党的五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随后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并于八七会议之后开始主持中央工作。在瞿秋白的领导和推动下，这一时期党的宣传工作得到高度重视和强化。1928年，党的六大通过了《宣传工作的目前任务》，强调党的宣传工作要“增加对于扩大群众工作的注意”，两个具体任务是“增高一切党员的政治知识”“增高党在广大工农群众中工作和宣传



员的理论上的认识”。同年10月，党中央向各级党部发出《中央通告第四号——关于宣传鼓动工作》，明确要求全党上下“建立经常的宣传鼓动工作，建立并强健各级党部的宣传机关”。为进一步规范和加强党的宣传工作，党的六届二中全会通过了《宣传工作决议案》，其中不仅提出了“加强宣传工作的具体化群众化”等一系列宣传工作的方针、政策，还指明了宣传工作的各项任务，如加紧翻译出版马列著作，开展理论斗争，组织社会科学和文学戏剧团体，通过扫盲识字、编印发行画报画册及通俗小册子的方式向群众开展理论宣传和政治鼓动，等等。

瞿秋白是党内编写和译介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先行者之一，始终战斗在党的思想理论和宣传战线上。他先后编写和译介多部有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著作，为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建设做了大量开拓性、奠基性的工作，与此同时，他对党的宣传工作也进行了大量理论上的探索。

明确提出革命斗争中的文化领导权问题。1932年，瞿秋白在《欧化文艺》一文中指出，无产阶级文艺运动的中心问题，是“争取文艺革命的领导权的具体任务”，无产阶级应当开始有系统的斗争，去开辟文艺大众化的道路。只有这种斗争能够保证无产阶级在文艺战线上的领导权，也只有无产阶级的领导权能够保证新的文艺革命的胜利。

强调文艺革命的大众化。瞿秋白在《鬼门关以外的战争》《学阀万岁》等论文和杂文作品中，颂扬了无产阶级文学即普洛文学，指出其任务是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瞿秋白认定普洛大众的无产阶级文学才是中国文学的

唯一出路。在《大众文艺和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普洛大众文艺的现实问题》等文章中，瞿秋白号召“革命文艺向着大众去”。他提出“普洛大众文艺的斗争任务，是要在思想上武装群众，意识上无产阶级化”，“普洛大众文艺应当在思想上意识上情绪上一般文化问题上，去武装无产阶级和劳动民众”。

用文艺来帮助革命。瞿秋白在《文艺的自由和文学家的不自由》一文中，强调无产阶级“要用文艺来帮助革命，这是要用文艺来做改造群众的宇宙观和人生观的武器”。他认为，只有通过大众化的普及，文艺才能突破“曲高和寡”的门槛，真正为人民群众所欣赏。通过群众懂得的文艺方式去宣传党的性质、路线和主张，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才能教育和发动群众积极地支持革命、踊跃参加革命队伍，党才能获得更加广泛的群众基础。

宣传实践

“革命的理论永不能和革命的实践相离”，瞿秋白在他的论文集自序中这样写道。他认为，“革命的理论必须和革命实践相密切联系起来，否则理论便为空谈”。瞿秋白非常重视革命实践活动，在党的宣传工作中也是如此。五四运动后，瞿秋白参与创办了《新社会》《人道》等革命刊物。1923年，担任《新青年》季刊和《前锋》的主编，参与《向导》的编辑工作。1925年，参与创办《热血日报》等。1927年10月，中共中央组建了由瞿秋白领导的中央机关报《布尔塞维克》5人编辑委员会。除此之外，他还先后领导和推动创办《中央通讯》《红旗》《党的生活》《实话》《党的建设》等党报党刊。这些党的宣传载体在宣传文化战线上高举革命的旗帜，阐明党的性质和任务，传播革命的声音；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叛变革命、镇压人民的种种罪恶，为广大革命群众指出了斗争的方向。

瞿秋白积极投身文艺创作，通过文艺作品进行革命的思想动员。他的《江南第一燕》《一种云》《暴风雨之前》等诗歌和杂文作品中蕴含着对崇高革命理想的憧憬，对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事业的期望，以及对共产主义

必定胜利的坚定信念。为了鼓舞广大党员和革命群众的革命精神和斗争热情，瞿秋白创作了反映无产阶级斗争精神的《赤潮曲》《群众歌》等歌曲作品，曾在革命斗争实践中广为传唱。而他翻译的《国际歌》歌词也成为一代经典，激励着无数共产党人、无产阶级革命者的理想信念与精神斗志。

瞿秋白不仅具有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而且具备高超的文艺修养和优秀的俄文译述能力，他系统译介了大量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外国文学作品，还曾就五四新文学、文艺大众化等问题与“新月派”“自由人”“第三种人”等派别开展了一系列论争和论战。一次次思想交锋也使瞿秋白对党的宣传工作的理论研究更加深入，他不断地总结经验、提高指导宣传工作的水平。1931年9月，在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之后，瞿秋白与茅盾、冯雪峰等建立起密切的联系。在上海，瞿秋白同鲁迅一起指导反对国民党反动派文化“围剿”的斗争，推动左翼文化运动的发展。在瞿秋白的指导下，“左联”有计划地占领各种宣传阵地，扩大了革命文艺的影响力，也由此诞生了一大批传播至今的、承载着革命理想和民族精神的优秀电影音乐文艺作品，例如，电影《风云儿女》和主题曲《义勇军进行曲》等。

1934年初，瞿秋白到中央苏区工作，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人民委员会教育人民委员、红色中华报社社长兼主编等职。瞿秋白对苏区教育和文艺工作呕心沥血、悉心指导。他主编的《红色中华》，大力宣传红军战绩和扩大红军运动，报道群众踊跃参军和节约粮食经费支援红军的模范事迹等，有力支持和配合了反“围剿”斗争。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后，瞿秋白留在苏区坚持斗争，任中共苏区中央分局宣传部部长。1935年2月24日，他在福建长汀被俘，于6月18日从容就义。

瞿秋白在短暂而辉煌的一生中，为党的宣传工作和无产阶级文化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他长期负责党的宣传工作，服务大局、恪尽职守，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党的宣传、思想、意识形态工作学说，成为我党宣传工作的重要先驱。他的革命业绩、精神和思想至今熠熠生辉，激励我们前行。

向一棵树致敬

□ 王明新



“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弱之胜强，柔之胜刚”，我读《道德经》时，对这些话语深有感触，感觉在世万物中，确实存在这样的现象——有时看似柔弱者往往更坚韧更有生命力。在我人生经历中就有这样一棵柳树，印证了这个道理。

柳，修长的枝条风情万种地生长在家乡的河边，孩提时代耳熟能详的诗歌是唐代诗人贺知章的《咏柳》：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还有唐代诗人方干的《柳》：摇曳惹风吹，临堤软胜丝。浓淡谁为识，力弱自难持。《诗经》里的“昔我往矣，杨柳依依”……这就是柳树在我心中原本的形象。它婀娜多姿像柔弱的女子，像飘扬在心头思乡的愁绪，无论如何都与“刚强”两字联不到一起。但是，在我20多岁到东营胜利油田工作的时候，在黄河入海口见识到的一棵柳树，彻底改变了我原来对柳树“弱柳扶风”的印象。

东营是一片年轻的土地，大约在200年前这里还是波涛汹涌、水天相接的一片汪洋，滚滚而来的黄河水携带的大量泥沙一寸寸将这里淤积起来，把大海的边缘变成了新的“大陆”。沧海桑田，在这里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印证。

最初的时候，这片土地的大部分

区域都被厚厚的盐碱所覆盖，每年春天，如霜似雪的盐碱，在阳光下散发出冷冷的炫目的光。一场接一场的春风带走了泥土中本就不多的水分，使它更加贫瘠和干涸。因此，除了芦苇、红柳等耐得住干旱和盐碱的植物外，这里几乎寸草不生，更难看到一棵树。“晴天白茫茫，下雨水汪汪，鸟无枝头栖，人无树乘凉”，曾是这片土地的真实写照。

1975年，我有幸加入石油工人队伍的行列，成为一名石油钻井工人，第一次踏上这片土地，而我的前辈10年前就在这里支起第一顶帐篷，升起了第一缕炊烟。这个叫作“东营”的地方原来只是一个仅有十几户人家的小小移民村，却被石油工人亲切地称为“基地”，因为它是胜利油田会战总指挥部所在地。当时，映入我眼帘的除了一条光秃秃的街道和一些低矮的平房外，几乎看不到一点点绿色。但突然间，我惊讶地发现了几棵老柳树，它们躲在一个不显眼的角落里，树干弯曲、枝叶稀疏，脚下有一条深深的沟壑。看来，它们在这里已守望了很久。

第二次见到的树，依然是柳树。我所工作的钻井队在距东营近百公里的孤岛。钻井队用简易房围成的小院周围是一望无际的茫茫芦苇荡。钻井队因条件所限，平时除了土豆、大白菜外，一年四季也难得吃到点新鲜蔬

菜。那年夏天，几场酣畅淋漓的大雨过后，休班的时候，师傅们把我带进了一片柳树林，他们摘下头上的铝盔，把从树干上摘下的一只只黄澄澄的蘑菇放进去，回到钻井队，把野蘑菇丢进铁锅里，加上几个干辣椒一起煮，煮出一桶香气四溢的野味。柳树不仅能生长在这里，还能长出美味的蘑菇，颠覆了我的认知。

令我震撼的柳树，生长在孤东。从我所在钻井队的孤岛往东，大约几十公里就到了孤东。孤东油田被发现后，1986年孤东会战打响。在井架林立、钻机轰鸣中，一棵独出耸立在茫茫海滩上的树，惊艳了所有人的目光，这还是一棵柳树。根据树干的粗细，人们判断它已经有了几十年的树龄。神奇的是这棵树的种子是从哪里来的？大风刮来的？鸟儿衔来的？海潮冲上来的？人们不得而知。而它又怎样抵御了一场场风暴，抗击了一次次潮袭？日晒、水淹、干旱、贫瘠、寂寞，都无法让它屈服，它在这里顽强地扎下了根，并生存下来，长成一棵大树，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后来这棵树被石油工人保护起来，并命名为“英雄树”，从此“孤东一棵树”成为一种精神，成为石油工人的象征。

它的坚韧、强悍，激起了我的好奇心，便查阅了一下相关柳树的资料。一些科普资料显示：柳树性喜湿

暖至高温、湿润、向阳之地，生性强健，耐寒也耐热、耐旱，极耐潮湿性。原来它本性如此，纤细细叶、垂垂枝条的外貌下，却有着比其他树种更顽强、更扎实的品质，仿佛正应和了“弱之胜强，柔之胜刚”的道理。

如今的东营生态环境已经花团锦簇般美好，而我的脑海里仍会常常忆起孤东海滩上那棵孤零零的老柳树，想起它的不屈不挠、坚韧不拔。它是我心中的英雄，我深深地向它致敬！



自南宋初期至清末700余年间，姚安高氏家族是云南显赫的名门望族，有着“九爽七公八宰相，三王一帝五封侯”的称誉。高氏的家风家训和高氏子孙高翥映的政绩深为当地百姓赞颂。

高翥映（1647—1707年），字元廓，一字雪君，小字遐龄，号结璘山叟，别号问米居士，在清代康熙年间曾任姚安军民总管府土同知。高翥映自小天资聪慧，酷爱读书，过目成诵，在其父的严格教导下，博览经史、学古贯今。12岁时，承袭父职后补。26岁时，朝廷题准袭职，任姚安府土同知。后因参加平定四川米易、会理的暴乱，擢升提刑，分巡川东。1677年吴三桂之乱平定后，高翥映回到姚安，得授布政司参政道一职。但高翥映志不在仕途，37岁时，托疾辞官，传世职于儿子高映厚。后归隐结璘山，潜心教学与著述，成为云南历史上著名学者、思想家、教育家和人们敬仰的乡贤。

重教兴文。高翥映晚年创办结璘山馆，专心致志教书育人。川滇两地学子，不远千里，慕名而来，投入他的门下求学弟子数百人，其中考中进士者22人、举人47人、小有功名者135人，当时比较有名的一些文人，皆为他的门生。与此同时，高翥映还精研学问，一生著述颇丰，著书达81种，主要有《太极明辨》《金刚慧解》《心经发微》《四书注》《春秋时义》《问愚录》《妙香国草》《鸡足山志》《滇鉴》《史翰》《结璘山草》《理学粹》等。据《光禄镇志》记载，高翥映“凡经史子集，宋元以来先儒学说，与夫诗、古文辞、佛藏、内典，皆能窥其底蕴而各有心得……皆能扫前人支离，自辟精义，并于先儒偏驳处时加以救正。从佛释哲学，到老庄思想、孔孟儒学及历史、地理、文学、医学、慈善救济、民族文化教育乃至音韵、天文、历算，高翥映均有涉猎和真见。其中《太极明辨》是他哲学思想的代表作，在当时学术界尤有影响；《金刚慧解》是他佛学研究的代表作；《鸡足山志》《滇鉴》均是研究云南历史的重要佐证。”

心系百姓。高翥映在为官时非常注重农田水利工程建设。据《民国姚安县志》记载：清土官高翥映在城北八十里怀远乡，修筑小芦川官坝，面积达四十余亩，可灌溉小芦川田地六百余亩。高翥映在其著述《迪孙·得反》篇中提出了“官以教养民，爱之如子，慈之犹母，故民争有亲上死长之心”的观点。他通过列举暴政引发的秦朝陈涉起义、唐末黄巢起义和殷商时期商王为了不让百姓遭受黄河水害多次迁都的历史事例，从正反两方面阐明一个道理——“虐民者亡，爱民者昌。”

体现他反对暴政、关心民瘼的仁政主张。他在《迪孙·民望》篇中提出：当官必须以百姓为本，不能为了私利而损害老百姓的利益。如果这样，就会败坏社会风气，失去民心。离官去职后，高翥映同样心系百姓。他在《教民树艺议》一文中提倡，要开荒种树、安置游民，改善百姓生活。在《维风权宜》一文中提出，应当通过民间办学来提高乡民素质，通过倡导尊老爱幼、崇尚公德来改善社会风尚，通过兴办各种福利事业来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让他们得以安居乐业。更加难能可贵的是，高翥映不但这样主张，而且躬身践行。据《高雪君先生家传》记载，“先生慈祥在抱，喜施济，凡施药、施棺、养老、放生、掩骼、埋瘠，及一切济贫扶困

笃学重民的清代学者高翥映

□ 陈 杰

之事，皆捐资为之，无所吝”。高翥映以其义行善举，得到地方百姓的敬仰和尊崇。

忠孝传家。高氏家族源流久远，而世代以忠孝传家。据《光禄镇志》记载，东汉时期，高氏远祖从江西庐陵进入西南地区，出三国时期逐步发展成越嵩郡（今四川西昌）的大户。诸葛亮南征时期，高氏一世祖高定为越嵩郡叟帅。后晋天福二年（937年），善臣守高方建立大理国，被封为岳侯，出任大理国宰相。其后，三十世祖高升泰自立为王，其子高泰明遵父遗志，让位段氏，世为相国，高氏子孙被遍封八府四郡，受人敬仰，赢得了“让国公”的美誉。高氏后代世袭姚府、姚州土官，延续700余年，创造出了光禄古镇“一座姚州城，半部云南史”的历史传奇。高氏家族世代传承下来的思君恩、念祖德、孝父母、奉三宝、钦家庙、教子孙、待宗族、培德行、禁骄奢等家训，体现了高家注重修身正己的良好家风。高翥映著有《训子语》《懿文馆课艺》《高氏家范》《慎独楼静言》等论著，是高氏家训的重要组成部分。民国邑人赵鹤清撰写一副楹联，概括姚安高氏的身世和功绩：“九爽七公八宰相，三王一帝五封侯。”《民国姚安县志》有词赞曰：“邑中高氏，世秉忠节。”

身为土官的高氏家族，始终坚守本分，留下良好的家风家训，深刻影响着高氏后人和姚安民众。高翥映是传承其家风的典范，他一生正心明道、慎终如初，无论是做官还是治学，都赢得了云南百姓的爱戴和赞誉。

